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0.01.017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赵守飞, 武先骐, 武廷会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 长期以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 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 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 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 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 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 五合模式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0)01-0091-06

Study on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Wuhe Model of Rural Governance in Dawei Town, Anhui Province

ZHAO Shoufei, WU Xianqi, WU Tinghui

(School of Fi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To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critical decision made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the course of exploring an appropriate path to rural governance, Dawei town in Anhui province developed a distinctive Wuhe model of rural governance, which refers to the rural basic-level party building's "unity" as the leading force, the rural governing spaces' "integration" as the platform, the rural governance subjects' "coalition" as the basis, the rural governance approaches' "combination" as the means, the migrated-back village residents' "harmony" as the target of innovative rural governance. Such a Wuhe governance model solved the problems of weakening basic-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reduced author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inactive involvement of rural residents, and imperfect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ies, greatly contributing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Dawei town's rural governance.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governance; Wuhe model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 我国是农业大国, 乡村的发展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要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 实现农业现代化。^[1]当前我国面

临经济下行压力大,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 改革进入了攻坚期, 深水区, 必须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核心, 巩固发展农村农业, 实施乡村振兴。为了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

收稿日期: 2019-11-18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协商有效运作的路径创新研究(AHSKF20187D01)。

作者简介: 赵守飞(1975—), 男, 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 乡村振兴和城乡社区治理。

治理的统一领导,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促进农村和谐稳定。《意见》指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框架治理体系,农村基层党建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深度发展村民自治和民主协商,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到2035年,乡村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充分结合,增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基本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根据已有文献发现,对乡村治理的论述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强调乡村治理的主体作用。丁志刚和邓延涛认为当下三农问题的解决,乡村的治理不能单纯地依靠农会的作用,“三农”问题也并非由于农民缺乏组织所致,而是应该更多地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2]。李齐和李欢欢认为乡村治理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给予乡村治理所必备的行政资源,没有将乡村治理安排在政府政策议程的优先位置,没有得到政府重视^[3]。吴欣认为基于我国农村发展基层民主的特殊情况,乡村治理更加需要党的统一领导与科学指导。通过增强党的自身建设和转变党的领导方式积极融入村民自治中,实现党的领导与自治民主的共同发展^[4]。李勇华认为乡-村体制割裂了乡镇与村庄的内在联系,形成了分割分治的治理格局,带来了乡村治理的低绩效。因此必须对其体制重塑,对“乡政村治”作些调整、实现村民自治,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形成乡与村相互联系的格局^[5]。曲延春认为近年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如农民利益分化、乡村选举民主实施困难等问题,而协商民主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讨论热点。协商民主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其核心是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对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乡村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6]。第二种是强调优化乡村治理模式和治理结构。南刚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并推动了乡村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显现,需要扩大民主自治的范围,适时扩大到乡一级,建立“乡村民主自治”模式^[7]。王春光认为政府借助于向村庄投入公共财政、开展公共服务使得村委会逐渐“行政化”。村委会“行政化”确实弥补了政府在村庄行动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难题。为此政府在乡村要建构自己的治理机制,改进乡村治理结构,建立村委会、村党组织与村民代表组织,打造三者合作又监督的关系^[8]。

上述学者对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各有侧重点。但是多数文献一是从单方面对乡村治理进行探讨,没有形成完整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框架。没有明确各乡村治理要素主体的定位和责任,也没有表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关于乡村治理需要哪些社会要素?这些社会要素之间又具有哪些关联?如何使这些要素相互配合,形成独特的乡村治理体系和乡村治理模式?这些问题,现有的文献并没有很好地回答。本文试图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深入研究乡村治理要素的构成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并建立新型的乡村治理框架,总结出创新性的乡村治理模式——“五合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治理体系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二、五合模式:乡村治理的大圩经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安徽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部署要求,以及合肥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乡村振兴、乡镇服务能力建设和城乡社区治理的相关文件精神,大圩镇积极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夯实乡村振兴基层基础,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乡村治理的“五合模式”。“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实现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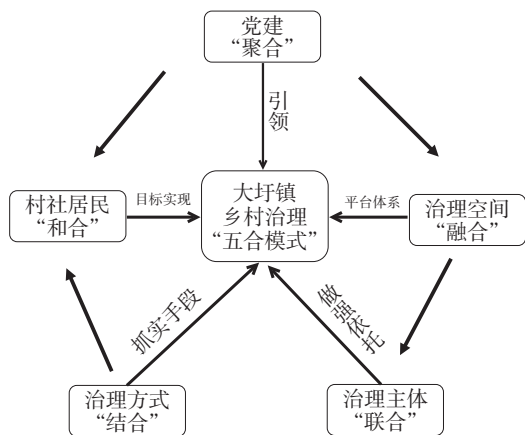


图1 “五合模式”示意图

“五合模式”深入贯彻党领导一切的方针,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增强农村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和公信力,聚合村内资源,带领村民致富。该模式实施以

来,大大提升了大圩镇居民“主人翁”意识,促进了居民在村社组织中、社会组织在乡村发展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大圩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形成治理主体多元化,提升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独特的“五合模式”是大圩镇在乡村治理中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得出的一套基层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理论。

(一)基层党建“聚合”——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1. 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

近年来农村“空心化”和基层党组织弱化问题日益严重,导致农业发展缓慢,经济受挫。针对这一问题大圩镇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方针,强化基层党建的引领工作,把基层党组织延伸到每一处,探索“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大圩镇坚持聚合资源,聚合党员,聚合群众,依托四万亩都市农业公园、大圩镇农业产业协会、龙头企业 and 种植户自发形成的产业联合体,建立了“产业联盟—产业协会—产业联合体”生产组织体系,组建了“大圩都市农业产业联盟党总支—产业协会党支部—产业联合体党小组”的党组织网络,并让党员直接参与大圩镇农业产业的重要事务协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同时,也设置意见箱和监督举报电话等,充分接受群众监督。目前,在基层党建的引领和群众积极参与下,大圩镇农业产业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果,并将这些成果回馈给村社居民,先后建成全镇第一所公办幼儿园、公办敬老院、村级卫生站等公共服务设施。大圩镇群众在农业产业发展中致富,看见了成果,就会更加信赖党组织,依赖党组织,提升了党组织的公信力,无形之中化解了很多矛盾。

2. 丰富党建活动

为了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适应新农村的建设需要,大圩镇设立了“党员365服务平台”和五个实践基地:“党性教育”拓展基地、“双培双带”实践基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地、“双向带动”示范基地、“生态发展”引导基地。依托“一平台五中心”,大圩镇把党员教育培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进行三项活动:一是开展新型农民培训。定期开展实用技术和专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农业生产能力,解决好农业技能培训“最后一公里”问题。二是引进农业新技术。大圩镇与中化化肥展开合作,在部分葡萄园试点实施“水肥一体化”项目,努力做到节水节肥、水肥一体,减小水传播病害的概率,使农产品增产增收。三是打造互联网+农

业新平台。大圩镇努力打造“七彩田园”电商平台,全程产业链上标准化运作,统一采购、统一包装、统一运营、统一配送、统一售后。实现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拓宽销售渠道。依托互联网技术,建设智慧农村,智慧农业,提升大圩镇农业现代化水平。

(二)治理空间“融合”——打造乡村治理平台体系

大圩镇严格按照党委文件精神,合理规划国土空间,实施“拆迁不征地”的“大圩回迁模式”,建立起新型城镇化回迁社区——金葡萄社区,截至目前,金葡萄社区入住人口已超过2万,治理难度大。

表1 金葡萄社区居民需求基本情况调研

调研内容	调研选项	人数
性别	男	696
	女	576
	总	1 272
是否知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具体位置?	知道	1 033
	不知道	239
是否参与过区日常的活动?	经常参加	158
	偶尔参加	597
	从不参加	448
您一般通过什么渠道反映需求?	不反映	101
	物业公司	430
	楼长	524
	电话、网络	173
您知道社区目前开展了哪些服务项目?	当面反映	307
	心理咨询	70
	社区图书馆	456
	社区合唱室	187
您觉得社区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哪些?	影视放映	590
	其他	4 406
	缺少便民服务	261
	环境脏乱差	259
	社区活动少	272
您个人方面有哪些需要社区协助解决的问题?	治安效果差	178
	车辆乱停放	868
	其他	1 975
	日常生活不便	282
	居家养老服务	360
您觉得社区当前应该优先配置或解决的突出问题?	青少年活动	330
	残障康复照料	169
	其他	591
	居民议事交流场所	164
您是否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社区志愿者?	公共健身场所	286
	配套大型超市	392
	电瓶车停放充电	668
	其他	1 943
愿意参加	451	
暂时没时间参加	821	

大圩镇政府为了更好地建设金葡萄社区,满足居民需求,开展了金葡萄社区居民需求调研活动。本次需求调研中,接受调研的男性696人,女性576人。30岁及以下168人,占总受访人数13.2%。31~60岁的共计915人,占总受访人数71.7%。60岁以上的239人,占总受访人数18.7%。共计发放调查问卷1410份,回收有效数据表格1272份,此次调研信息有效率为90.2%,为金葡萄社区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思路支持,调研结果具体见表1。

调研结果显示,社区居民一般向物业和楼长反映问题,也能了解社区目前存在的不足和希望迫切解决的问题,但参与社区活动的次数不多,积极性不高。暴露出乡村治理平台的缺失,造成居民和社区之间缺乏沟通,居民无处反映,社区无力解决的情况,加大二者之间的间隙。大圩镇通过大幅压缩需求解决的纵向层级,将部分治理权力下放,实施扁平化管理,提高治理效率。如线下建立村社公共服务综合平台,为村社居民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深度思考村社居民提出的需求,联合党员干部,召开问题需求解决讨论会,对于村社居民合理的需求要加快解决。对于难度较大,无力解决的需求,召开社区会议,张贴公告,说明无法解决的原因;线上建立“金葡萄家园”微信公众号交流平台,平时及时准确推送信息,截至2019年5月,公众号共推送信息722篇,总阅读量为60238人次。

(三)治理主体“联合”——做强乡村治理的依托

1. 党委政府与高校智库及社会组织的联合

党委政府在乡村治理中不是万能的,当政府无力做某些事时,会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由企业、社会组织根据居民需求,结合当地特色提供优质、个性化服务。大圩镇党委政府与社会企业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委托他们进行乡村公共服务硬件设施建设,目前村社内各类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基本完备,如老少活动中心、乒乓球室、农村留守儿童之家、道德讲堂等场地,公共服务丰富,能够满足村社居民的精神需求;大圩镇与安徽财经大学中国乡村(小岗)振兴研究院、安徽省社区治理研究院和安徽省实践家基金会创办的社工机构联合打造大圩镇社区治理学院并开设党建和治理系列课程,开展教育培训,提升管理者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的专业水平。

2. 党委政府与各个部门及村社的联合

党委政府需要与各个部门、村社、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发挥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截至目前,社区共挖掘楼长60名,

楼栋党小组长16名,党员监督员22名,党员志愿者270名,正在把党组织引领作用渗透到社区的每个角落,努力形成由楼栋党小组长、楼长、志愿者、社区网格责任人等共同组成的楼栋服务力量。全方位了解居民矛盾和问题,切实解决居民问题需求,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小区”。做到“一盘棋”式的居民服务,落实“一张网”的社区治理体系格局^⑨。

(四)治理方式“结合”——抓实乡村治理的手段

1. 组建社区居民自治委员会

金葡萄社区居民自治委员会的建立实则提供了居民自治的平台,在此平台上,居民可以明确上个月社区已经做了什么、本月社区要做什么,激发了居民自治兴趣。定期召开楼长交流会,由社区和物业汇报工作,并听取楼长在居民中收集的问题、需求及讨论改进意见;举办楼栋好人活动,线上线下的多种媒体平台宣传楼栋好人好事,树立居民榜样,打造和谐氛围。截至2019年5月,金葡萄社区居民自治委员会共召开和美楼长交流会12次,举办和美楼栋好人活动,收到投稿36篇,大大拉近了居民与社区治理的距离,使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活动效果显著。

2. 成立社区协商委员会

金葡萄社区协商委员会定期开展各类协商议事,把社区问题摆在桌面上,各治理主体针对社区公共场地使用、物业监管、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文体活动开展等方面的问题畅所欲言,共同协商,出谋划策,为社区工作提供法治支撑。各治理主体在遵循资源共享,和平协商,共同治理,成果共享的原则,积极与社区单位对话,寻找问题的最优解。如社会热门的广场舞扰民问题在大圩镇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大圩镇居民在小区内部广场跳广场舞,已有其他居民通过各种途径投诉其存在扰民问题。社区经全面调查,约谈各支队伍负责人,一方面社区组织居民文艺骨干与各支队伍深入协商交流,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协商委员会协调,多方联动,齐心协力,逐步将小区内部各支广场舞队伍引导到商业街休闲区域锻炼。2018年,金葡萄社区协商委员会组织召开各类协商会议18次,依法民主开展社区协商活动63次,协商成果众多,社区协商委员会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3. 建成社区道德建设委员会

大圩镇坚持让居民自评“社区建设得怎么样”,“社区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增强居民的社区建设责任感和道德感。通过不定期举行道德宣讲、举办社

区好人等正能量活动,在日常生活中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道德文化,潜移默化地感染社区居民。截至2019年5月,大圩镇社区道德建设委员会实地评选和召开工作会议各4次,外出参观学习1次,培育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员10名,评选社区好人6名,开展主题宣讲5次,取得了不凡的成果。

(五)村社居民“和合”——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

1. 建设和美阵地

在党建的引领下,大圩镇打造多层次、多样化的和美阵地,建设和美堂屋、和美楼栋、和美睦邻中心、社区治理学院等平台,形成了全面覆盖的村社和美阵地体系,推动了村社居民“和合”平台建设,逐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按照“资源共享”“一室多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好社区资源,发挥最大效应。加强社区与镇部门单位的联系交流,提倡活动共办,做到问题共商。大圩镇按照发展原则,统筹规划约6000平方米的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由金葡萄社区统一对接,在大圩镇全域实现阵地共享。

2. 培育和和美队伍

乡村治理需要专业、优秀的人才资源为乡村建设出谋划策,提高治理水平。通过“引进来”,统一招考大学生社区工作者,为社区治理注入新鲜活力;“促合力”,村社联动双重管理;“育自治”,加强对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培训力度,提高能力素质。培育优秀人才,抓住居民真实问题需求,壮大社区自治力量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

3. 推进和美项目

落实“红色领航”,增强党群融合聚心力,大圩镇成立区域化党建与基层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构建“社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示范户”的全覆盖党组织网络^[9]。不断深化楼栋服务项目,把社区党总支的触角向楼栋和居民家庭延伸,全面强化党组织的凝聚能力、服务能力和治理能力。依托“金葡萄社区居民自治委员会”“金葡萄社区协商委员会”“金葡萄社区道德建设委员会”三会力量,重点发展群众自治,依法协商,文明弘扬。通过开展党员示范户、文明家庭、和美家庭、书香家庭、绿色家庭等各类优秀家庭评选活动,弘扬身边正能量,树立社区居民榜样,让一个个优秀家庭成为吸引和感染身边人的鲜活事例。融千百小家,成和美大家。结合和美项目制定一套完善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先后成立了“文明卫士”“青跑团”“金扳手”等多支志愿服务队伍,在弘扬传统文化、促进社区和谐、

维护楼栋环境、营造楼栋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截至2019年5月,共开展安全检查18次,处置各类安全隐患67件,处理各类居民反映问题约1400件,协调物业服务管理各类事宜约320次等多项活动。通过和美项目的推进,实现“和美”理念贯穿金葡萄社区治理的始终。

三、研究结论

1. 加强村社党建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核心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制度变迁一直是由政党和国家力量所强力推动的,即使在多中心、多元主体治理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的今天,仍然必须非常关注乡村治理中的党和政府的角色定位和行为。当前村组织和村干部作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农民的沟通桥梁,身份模糊,定位不明,难以发挥党独特的引领作用^[1]。推动中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方针,加强村社党建,通过党组织强大的号召力、感染力,聚合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创新基层党组织建设机制,建立区域化、功能性基层党组织,使党组织的服务延伸到村社居民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增强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工作能力。

2. 建立多元主体联合参与的体制机制、加强社区协商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制度安排

党委政府需落实“简政放权”政策,将一部分治理权力下放给社会组织,实现专业化、个性化治理。政府通过“内生”“外引”两种方式,一方面积极培育乡村自生的村社组织,另一方面积极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 and 高校智库,实现多方主体共治、共建和共享。参与主体的平等化是建立多元主体体制机制的前提和关键,只有在平等的条件下人们才能够进行理性的社区协商,如果参与主体地位不平等,也就不可能实现公平的对话和理性的沟通。

3. 搭建立体型分工的治理平台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關鍵

科学合理分工,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职责,有利于节约乡村治理的成本,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在乡村治理系统中,每个治理主体都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因此,科学合理的分工是治理好乡村社会的关键。过去,我国乡村治理更多体现的是垂直分工,呈现的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种垂直分工的治理体系很明显打压内部成员发展动力,乡村发展固化,缺少活力。结合当前我国农村发展状况,乡村治理应当建立立体型分工的治理平台,使垂直

分工和水平分工相结合,并且要更多地鼓励水平分工,协同资源的调配,避免因重复治理而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提高乡村治理效率,彰显乡村治理水平。^[12]

4. 自治、法治与德治结合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

依托“社区居民自治委员会”“社区协商委员会”“社区道德建设委员会”三会力量,重点发展群众自治,依法协商,文明弘扬。一是加强村民自治实践,完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与制度体系,制定激励制度,激发村民参与治理的兴趣;二是坚持协商民主,通过加强村民素养的培训,加快制定协商制度,利用“内生外引”加快发展乡村社会组织,充分

发挥依法协商的作用^[13]。三是弘扬优秀中华文化传统道德规范,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多次开展“社区好人”征文活动,对“社区好人”的光荣事迹进行宣传 and 嘉奖,发挥先进示范作用,营造社区和谐环境,提升居民素质。

5. 组织化参与和项目化实践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一些符合需求的便民设施与服务,需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将乡村问题和居民需求一个个项目化,调动乡村内外社会力量,压实主体责任,以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为载体,多方共同参与,推动乡村公共需求问题的解决和乡村治理实践的深化。

参考文献:

[1] 李城,王厚俊,李磊.乡村振兴战略中农业地位与农业发展研究[J].河南农业,2018(20):61-62.

[2] 丁志刚,邓廷涛.“三农”问题、农民组织与乡村治理[J].开发研究,2007(1):76-81.

[3] 李齐,李欢欢.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J].理论探讨,2017(6):19-26.

[4] 吴欣.乡村治理中党的领导问题——基于成都村民议事会制度的分析[J].理论与改革,2012(5):48-52.

[5] 李勇华.乡村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双重转型[J].浙江社会学,2015(12):76-157.

[6] 曲延春.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发展逻辑与推进对策[J].农村经济,2011(11):16-18.

[7] 南刚志.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J].中国行政管理,2011(5):70-73.

[8] 王春光.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未来发展方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3):44-55.

[9] 林明语,钟莉.社区法律服务问题研究——以广州市社区为例[J].法制与社会,2014(14):71-73.

[10] 沈蓓绯,金莲.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社区党员分类式教育管理机制[J].唯实,2018(11):47-51.

[11] 董磊明.转型与乡村治理中的政府行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2):54.

[12] 殷民娥.多元与协同: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主体关系的路径选择[J].江淮论坛,2016(6):46-50.

[13] 罗维,孙翠.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发展瓶颈及深化分析[J].农村经济,2013(8):8-13.

(上接第83页)

参考文献:

[1] 刘霓.社会性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2001(6):52-57.

[2] 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7.

[3] 汤夺先,顾菲菲,余涛.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述评[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6.

[4] 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M].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1.

[5]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83.

[6] 董晓媛.照顾提供、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J].人口与发展,2009(6):61-68.

[7]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57.

[8] 李俊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现状与问题[N].中国科学报,2014-03-28(6).

[9] 李丹丹.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现状及其制约因素研究——以河南省M村为例[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5(28):171-172.

[10] 易连英.抵抗与差异:反思后女性主义背景下女性新形象[J].北方文学,2012(5):94-95.

[11] 李宝芳.社会性别视野下的流动人口流动研究[J].南方论丛,2017(1):64.

[12] 万志琼.少数民族妇女外流的成因分析——以楚雄彝族妇女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63-66.